
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

# 红一方面军卷

8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

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



# 红一方面军卷

8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本册收入第七至第八部分文章 70 篇



## 一袋干粮

刘文章

每当想到长征中那些艰苦的日子，我就想起了终生难忘的谢益先同志。

谢益先同志参军前是个贫苦的农民，他和母亲、还有一个几岁的弟弟，一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，直到红军到达他的家乡，才翻了身。可是不久，反动派又回来了，并且打死了他的母亲。他含着眼泪埋葬了母亲，把不懂事的弟弟寄养在亲戚家里，自己参加了红军。

谢益先同志日常言语不多，工作可比谁都做得多。来到部队以后，很快便成了一个很好的红军战士。一到战场上，他就不顾一切地冲杀敌人，恨不得一下把所有反动派消灭光。但对待贫苦的人民，却恨不能把心都掏给人家。

部队到了毛儿盖，上级决定在这里筹粮，准备过草地。那时虽然正是收获季节，可是由于部队多，粮食少，每人只分了三四斤麦子。大家都把它看成宝贝，缝个小布袋装起来，走路带着它，睡觉枕着它，有人还在袋子上绣上了自己的名字。谁心里都明白，这不仅是三四斤麦子，而是自己的生命呵！缺了它，要想活着走出草地是困难的。

就这样我们带着这仅有的一点点口粮，踏上了茫无边际的草地。

一天，我们正在没膝的水草中走着，忽然听到前面有孩子的哭声。走到近前一看，原来是一个面黄肌瘦的妇女，带着两个孩子坐在路旁，

哭声是那妇女怀里的孩子发出来的。看他们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，就可以知道饥饿在折磨着他们母子三人。但母亲总是母亲，虽然她已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仍一面拍着怀中的孩子，一面安慰着：“好孩子，别哭，明天妈给你买烧饼吃。”身旁那个大孩子听说烧饼，抬起头来，有气无力地问：“妈妈，能买到烧饼吗？”母亲脸上滚着泪珠，呜咽着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我们的心像被什么击打着，人们都在这里停了停，有的抓出一把炒麦递给了那个妇女，有的摸摸已干瘪了的粮袋含着眼泪走开了……

部队又继续前进，但行列里却看不到谢益先同志了。我们正在着急，他从后边赶上来了。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他：

“你怎么掉队啦，病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看那两个孩子来！”他沉重地回答。

“你认识他们吗？”

“我怎么会认识他们呢！那个妇女说，她是川陕根据地的，亲人都被国民党杀了，房子也烧了。她和一些老乡们在红军掩护下，才带着孩子逃出了虎口。如今他们断粮了，大人还好说，可是孩子怎么受得了？”

听了她的话，大家心里都沉甸甸的。部队默默地前进着。

从那之后，谢益先同志有了不寻常的变化：以前，一到宿营地，他就忙着帮大家弄水，拾柴，烧水；现在呢，只要放下背包，他就一人走开，等大家吃完东西，他才露面。要是问他：“吃了吗？”他就拍拍自己的肚子说：“吃饱了！”次数多了，大家就不信了。后来，秘密终于暴露了。原来他是有意避开大家，去找野菜吃；遇到没有野菜的地方，就干脆喝点凉水了事。

这样下去怎么行呢？班长对他说：“你多少还是吃点粮食，要是不够，大家可以凑点！”

“日子长着呢，能省就节省点。班长，你放心，我还有呢！”他坦然地回答。

“别把身体拖垮了！”

“没什么，在家里吃苦吃惯了。”

话是这样说，但他的身体却越来越不顶事。我们常常看到他走在路上直打晃；也常看到他皱着眉头不声不响地紧腰带。那时候我们都很瘦，但他瘦得比我们更厉害。就是这样，他的工作仍丝毫没有松懈，有事就和别人抢着干，哪次到远处送信都少不了他。

终于有一天他支持不住了，一步一喘，几步一歇。领导上见他跟不上队，就叫副班长扶着他在后边走。就在路上休息的时候，他躺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。后来听副班长说，他在牺牲以后，嘴里还喃喃地叨咕：“那两个孩子不知怎么样了？”直到副班长告诉他，到团里送信的同志曾经看到那个妇女还跟着团部的时候，他那瘦削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

大约是在走出草地的那天吧，我们又看到了那个妇女。她带着两个孩子站在路边正东张西望，一下子认出了我们，便高兴地走近来，笑着向我们打招呼：

“喂，同志，姓谢的同志在吗？”

“叫谢什么？我们有好几个姓谢的。”

“咳，就是不知道叫啥名，问他几次他也不说。要不是他留下的这条粮袋，我连他姓什么还不知道呢！”说着，她拿出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干粮袋，上面用白线歪歪扭扭地绣着一个“谢”字。这不是谢益先同志的吗？怎么到她手了呢？没等我们询问，她就说开了：

“那可真是个好同志，救命恩人哪！那天，你们都走过去了，他站在我们跟前问长问短，直看着我那空米袋子摇头。后来，他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我。这可不行，粮食就是命，我怎么能收呢？可他说：‘拿着，大人好办，孩子不吃东西不行啊。’说着，丢下粮袋就走了，我怎么喊，也喊他不应；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也不吭声。唉！多亏这些干粮哪，要不，我们娘儿三个早就饿死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又问那个姓谢的同志

在哪里。

现在我们才明白，谢益先同志不吃粮食，是因为他没有粮食了。谢益先同志啊！你在这生与死的边缘上，所想的只是别人！我们都忍不住地落下泪来。

“出了什么事情？”那个妇女收敛了笑容，不安地问。

“他……他死了！”我们有个同志回答。

她愣住了，眼圈红了，紧接着两颗亮晶晶的泪水，顺着她那干瘦的面庞流下来。她低下头，两手抖动着紧紧抓住那条已经空了的粮袋，两眼呆呆地看着上面的那个“谢”字。

“妈妈，别哭，今天不就走走出草地了吗？”那个大孩子扯着母亲的衣角说。

母亲像从梦中惊醒，弯下腰，对着孩子们一字一泪地说：

“今天是要走出草地了。孩子，可要记住呀，我们是红军叔叔用生命救出来的啊……”

选自战士出版社编辑：《星火燎原》选编之三，战士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，第183—186页。

刘文章，身份不详。



## 在草地的一日

黄思梅

一天的行军，使人疲劳无力，晚上大家都希望找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躺一躺，弄个火，烧碗开水喝，也烤烤湿透了的衣服。可是，草地的自然环境，就连这个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希望也落了空，我们仍在草地上，将就了一夜。

天蒙蒙亮，我们的班长邱成同志，按着指导员的指示，拿着他的破旧的烧得漆黑的洋瓷碗，细心地分配着班里仅有的也是最后的一点青稞麦，虽然这些未成熟的青稞麦，由于烧得焦黑，吃起来又苦又涩，但大家拿着它，就像得了宝贝一样，喝着河沟的冷水，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地嚼着，咽下去，这就是今天唯一的早饭。

黄淡淡的太阳已从东南角爬上了草地，我们收拾好了昨晚放在地上的东西，又照常出发了。部队像一条长龙，看不见前头和后尾，继续在这无边无际的穷荒草原上，向东北方向挺进。同志们一个个都拖着被草地的毒水泡得又粗又肿的双腿，在没及脚面的污泥浆中，吃力地行走着。疲劳加饥饿，当然是够呛了，但谁也没有说出口，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意志：战胜困难，就是胜利。

8月的草地气候，真是变化无常，不可捉摸。中午时分，顶头太阳晒得草地上的腐草污水，蒸发出一种说不出的怪气味，使人头昏脑胀，闷热得连气也喘不出来。可是，不大一会儿，四面乌云密布，电光

闪闪，雷声隆隆，不知什么地方刮来一股大风，暴雨也随之而来，风雨中还夹杂着“冷子”（冰雹），没头没脑地打下来。同志们为了不被“冷子”打伤，把背包、洋瓷盆当作雨具，有的脱下衣裳，顶在头上，在这紧张的时刻，队伍被风雨阻挡得不能前进，互相叫喊着，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，忍受着暴风雨的袭击。约莫一个钟头，风把乌云吹散了，太阳又从云缝里探出头来，同志们穿着湿透的衣服，背上湿透了的背包，歪歪扭扭地在泥浆中又继续前进了。

在经过毛儿盖时，本来做了尽可能的防寒准备，上级发了毛布和生山羊皮，各人自己动手缝制了衣服，可是在这番狂风暴雨的袭击之后，寒冷仍然是刺人皮骨。多日来的日行泥泞，夜宿荒丘，加上不时的暴风雨的袭击，大家都在忍受着严重的折磨，每个人的体力正在大量地消耗中。

因病两天吃不下一粒粮食的我们的班长邱成同志，仍然和大家一样在这泥泞的草地上，拔着双腿上气不接下气地一步一步地走着，他额上的皱纹更加深显，颧骨特别突出，下巴越发尖起来，脸像黄表纸一样，尽管是这样，但他没有休息，也不能休息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，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当儿，谁要是坐下去，就永远再也不能起来了，要想摆脱这种困难境地，只有紧紧地随着部队努力朝前走。同志们和上级一再地要对他帮助和照顾，他不但谢绝了这种帮助和照顾，而且经常鼓励大家说：“我们是红军，是共产党员，谁要是经不起这个考验，谁就会在这里垮下去。”

太阳将要落土了，团部发出了露营的命令。部队就在一条小河的南岸停下来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宿营地。我们一放下自己的东西，趁着天还没有黑，抢着到处去寻找可吃的野菜。一进草地，像“灰灰菜”这样的野菜，根本找不到，好大一会儿，才找到一点硬得像芦苇一样的野葱和野韭菜，但这也不能不说是天大的幸运了。

班长邱成同志因病得太重了，我们都叫他留在那里看行李，他说：

“实际上在这个鬼地方，谁会来偷我们的东西呢，你们既然不许我去，那我就在这里等你们吧！”谁知道在我们走了以后，他将自己仅有的一条扎裤腰的皮带解下来，用刺刀切成几截，分放在班里每一个同志的行李上面，当我们采野菜回来的时候，他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不能同你们一道去采野菜，很对不起，你们就拿这点皮带去烧着吃吧！”接着，他又回忆地说：“这是我们打敌人五十二师时，缴获敌人连长的。”最后他又加上了一句：“那时我们的身体多好啊！我想我们走出了草地，身体一定还会好起来的。”

天渐渐黑了下来，我们披着毛布和生山羊皮，肩靠着肩，各人用自己的瓷碗，煮着野菜和皮带，准备晚餐。草地上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

选自李天佑、刘亚楼等：《星火燎原·未刊稿》第3集，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，第289—290页。

黄思梅，1915年生，福建上杭人。1929年参加赤卫队。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红军长征时是红一方面军某团战士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任军委总财务部干部处处长、总后勤部营房部政治部主任、沈阳军区后勤部顾问等职。2010年在北京逝世。

## 绝食的一天

何涤宙

三天来没有看见一间房子，我们真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过日子，诗人们是要大大的颂赞这种日子，可惜我不是诗人，没有诗人那种高情逸趣，不但对这伟大的自然不发生兴味，并且还是厌恶，三天来的风吹雨淋，日晒夜露，任凭自然来欺凌我，不少脆弱的生命为自然夺了去，我们现在正是同自然奋斗着，谁还有心情去欣赏野草闲花？！

偌大的一条人流，在草地中，从南向北流着，如果以茫茫的草地来比较，真还不啻沧海一粟，这人流的每个细胞都是曾经二万里的长征英雄，他们为着革命，要经历人类罕有经过的地方——湿草地。

每个人都在一边走一边嚼着炒麦子，炒麦子的味道似乎还胜过巧克力糖。在目前吃的问题是占着人生的第一位，在愈没有吃的时候，是愈想吃，而且是特别吃得多，眼看我的十五天粮食计划，为着想吃多吃，已经破了产！

从毛儿盖出发，每人自己带足了15天粮食、我的粮食是80个，每个约有二两重的饼子，是用粗得像小米一样的青稞麦粉，自己在脸盆里烤成的，另外有两袋炒麦子，一小袋生面，不到二斤；计划着饼子吃十天，每天吃八个，最后五天吃炒麦子，生面是在可能找到柴水时，做面糊糊吃。

三天来粮食竟意外的超过预算。饼子还剩下24个，麦子已吃了一

袋，如果长此下去，两天就有断粮之虑，草地谁也不能肯定哪天走完，即是走完草地，也不一定马上就有粮食补充，悔不该前几天太贪吃，以后无论如何要节省，自己觉得对于以前的浪费要加以惩戒，决定明天绝食一天，表示节省粮食的决心。

边走边想，肚子又有些发烧，明天即要绝食，今天一定要吃个饱，饼子留20个也不为少，麦子还可装一口袋，吃完这个，就要一直等到后天才能再吃。主意打定，在休息时，又从马袋里补充完满，不久，这亲手做的又香又硬半生半焦的青稞麦饼，又开始吃起来了。

真想不到饼子的味道会这样好，虽然粉是粗些，饼里既没有盐也没有糖，更说不上有鸡蛋牛奶，但是从前也曾吃过广东月饼，罐头饼干，都没有这样美，大概烤饼子一定要在脸盆里烤，而且一定要烤得半焦半生，才会有这样美味！

不一时饼子吃完，又很自然地摸炒麦子吃，要不是被雨打湿的话，炒麦子真配得“香脆”两字，可是现在发软了，好像吃五香豆。

行行重行行，拖泥带水，也不知走了多少里，太阳还老高着就宿营了。不用分房子，各人自找干燥避风的所在，我在十分钟内架起用夹被散开做成的帐篷，骤然间乌云满天，狂风一起，大雨随着来了，夹被帐篷里挤满了相熟的同伴，大家坐着，看人家淋雨，看树枝被雨打湿，说不上烧水洗脚。暮色笼罩着大自然，阵头雨改为毛毛雨，挤在帐篷里的同伴们，也就互相倚偎着追寻好梦，我为着准备明天绝食，摸出四个饼来，再饮餐一顿，在细雨霏霏的大自然的怀抱里，我们就这样又过了一宿。

选自刘统整理、注释：《亲历长征——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，第410—411页。

## 俘虏兵的一束话

周士第

蒋介石阻止红军北上抗日，企图困死红军于松潘以西绝无人烟的草地。派四十九师<sup>①</sup>为先遣队，由平武方面兼程来占领松潘以北的巴西阿西一带要隘，结果被英勇无敌的红军消灭二个整团于包座附近。师长伍诚仁和我本是同学，他如不是快一点落荒而逃，也会在这里会面呢！总政治部派我和王盛荣、王观澜二同志到包座做俘虏兵工作。

七八百个俘虏兵，在包座南端空麦田里集合。我们讲了话后，就征求他们的意见：“愿当红军的站到左边，愿回家的站到右边，依各个的家乡远近发路费。”

整齐的凹字队形，散乱和噪杂起来了。有些打开共同的包袱，各取各的衣服与鞋子，有些欠债的在还账，有些互相送东西，过去是很好的朋友，现在都分开了，表现出他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意志。

过了30分钟的光景，站到左边的有十分之七，站到右边的有十分之三。当红军的编为三个连，愿回家的编为二个连，都在一个喇嘛寺里住下。

我和王观澜、王盛荣二同志住在正中的一间房子。他们俩都到俘虏

---

<sup>①</sup> 四十九师原是张贞的军队。十九路军把张贞的军队改编与十九路军抗日先遣队合并，以抗日先遣队司令张突为师长。1934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失败，被蒋介石缴械改编，以伍诚仁为师长。

兵中去谈话，我在房子里和一个广东士兵（前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司令部当传令兵，现在团部当传令兵）谈话，渐渐地有十几个都是十九路军的士兵进来。

那个传令兵说话很多，大意是：在福建缴了枪后，就被武装兵硬押下船，经南京到武汉训练，不到两个月又开去打方志敏。此次是经西安来平武。前天打仗，不到二三个钟头，两个团都完全消灭了。师长在后面，带一个团走了。如是缓一点，那个团也是要缴械呢！我这个团死伤很多，二个营长阵亡，一个营长受伤，五个连长阵亡，二个连长受伤，一个连长失踪，一个连长被俘，团长与团副投河死了。我曾对团长团副说：红军不杀俘虏官兵。他们不相信，我拉都拉不住，他们二人抱着往河中一跃……

一个当班长的说：“我在江西福建都与红军打过仗，知道红军厉害，打也打不过。前天我们这个连<sup>①</sup>守一个山头，枪一响，我就劝连长不要打，缴枪给红军。连长听了我的话，我们这个连一个人都没有死伤。如果打起来，还不是一样要缴枪，恐怕又要冤枉死了好多人呢！”

一个士兵说：“十九路军排长以上的官长，都换掉了，放来的都是黄埔生。老团长奉乃武，不知道为什么事，被扣留在松潘坐牢。新团长才来二个礼拜，带来一批官长，又把奉乃武时代的官长换了好多，真是军阀都是培植私人的势力。”

又一个士兵说：“蒋介石不但不相信十九路军官长，就是士兵也不相信。我们在连上时常都有人监视，请假不准，开小差又要杀头，精神上是很痛苦的。生活上更不要说，每天吃两顿麦子饭，每顿每人分两碗，排长还要用筷子刮得平平，都没有一餐饱饭吃。就是杀头，天天也有人开小差，官长也有好多开小差的，我们的团副是开小差了。有一次派一连去运粮，连排长和好多士兵都开了小差，只回来12个人。”

<sup>①</sup> 就是第九连，连长卓权率领全连官兵缴械，得到特别宽待。

另一个士兵说：人家要卖国，还敢相信你这班在上海打过日本的人吗？我们回家没有饭吃，又找不到别个出路，跟着做走狗来打红军，想起来，真是可恨又可耻呢！打方志敏时，我们都是向天打枪，前天我一个子弹都没打。缴枪时，我叫红军官长看过我的枪筒。

第一连长（原是一个湖南士兵，今天提起来当连长的）在外边吹笛子唤吃中饭，他们就散去了。

七八个士兵坐在喇嘛寺右侧草坪晒太阳，我也参加进去。

一个安徽的士兵，他是一个贫农，在家中派去做马伕，被四十九师拉来当挑夫，后来拨下连去当下等兵。他说：“我的连长说：红军三天才吃一顿饭，现在见红军是一天三餐，恰与他的话相反。他说红军捉到是割耳朵，挖眼睛，开肚子。过去我也相信，现在才了解他们的欺骗。我这个头脑真蠢呵！”他用右手向头上打一巴掌，七八个士兵和我都笑起来。

“连长那天说：红军没有饭吃，杀蛮子来吃，我也相信，我应该打几个巴掌？”一个士兵笑着向前一个士兵问。

“如果说相信他们的话，就要打巴掌，我怕哪一个都要打几百个巴掌呢！”又一个士兵接着说。

“我就不要打巴掌，我是不相信他们的鬼话的。在武汉出发时，他们说的开去打日本，我就对班长说是假的，一定是开去打那个红军。在平武训话，说了十几个蒋委员长，你们都这样恭恭敬敬地立了十几个的立正，我就偷偷的休息。”一个湖南士兵站起来做立正姿势，又坐下去，继续来说：“他们天天吃酥油，我们只是流口水。我们昨天吃了二餐酥油，今天又吃一餐酥油，如不是到红军来，我们的嘴巴一辈子也不会尝到酥油的味道呢！特务连长被打断了腿，四个红军抬回来，医生又上了药。相信红军吃蛮子，挖眼睛，该打该打，你们再打打吧！”他越说，声音越大起来；口水都喷到我脸上。

14个十五六岁很活泼的小孩子，有些是当看护兵，有些是当勤务



兵。他们都是报名回家的。吃了中饭后，王盛荣同志邀他们到喇嘛寺后面山坡上去玩耍。过了一个钟头，我也去看看他们。走到半路，就看见他们回来。王盛荣同志远远地就对我说：“他们都愿意当红军了。”

“我要换一顶红军帽子。”

“我也要换。”

“我也要换。”

“我跟你当勤务兵。”

“我总要跟着你，我不到别处去！”

“我不下连。”

这十几个小孩子，喋喋不休地向王盛荣同志围攻。

“好、好、好！……”王盛荣同志一边走一边说。

“红军好不好？”我拉着一个当勤务兵的小孩子同行。

“好。”

“为什么好呢？”

“红军不打人。”

“还有什么好？”

“官兵平等。”

“还有？”

“官兵都是吃一样饭，穿一样衣服。”

“还有？”

“教我们读书。”

“还有？”

“好玩。”

“还有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就寝后，我要到各连看一看，出了右边的小门，看见二个俘虏兵在厨房里烤火谈话。